

歷代詩文

八代三朝

诗新选

湖北教育出版社

赵沛霖／著



名著新

从军，八十岁始得归家，
而国祚已一变为山河破碎。
第十个国祚和重慶出师表
而是田園牧歌，官城，官



责任编辑：杨唐轩

封面设计：汪 汉

历代诗文名著新选
八代三朝诗新选



ISBN 978-7-5351-4742-4



9 787535 147424 >

定价：42.00 元

代

诗

文

名

著

新

选



湖北教育出版社
湖北教育出版集团
赵沛霖 著

八代三朝诗新选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代三朝诗新选/赵沛霖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6

(历代诗文名著新选)

ISBN 978-7-5351-4742-4

I. 八… II. 赵… III. 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
IV. I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9942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网 址:<http://www.hbedup.com>

邮编:430015

电话:027-83619605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430223·武汉市江夏庙山开发区汤逊湖工业园)

开 本:850mm×1168mm 1/32

5 插页 19 印张

版 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434 千字

印数:1-2 000

ISBN 978-7-5351-4742-4

定价:42.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前 言

本书选诗的范围起于汉代,止于唐朝之前,前后历经了汉、魏、晋、宋、齐、梁、陈以及北魏、北齐、北周和隋等十一个朝代,大约八百余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正是我国历史上大起大落的时代:由强盛——衰弱——又走向强盛,从统一——分裂——又走向统一。在这段历史时期内,除汉代之外,政权更迭快,局势变化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头绪纷繁的局面。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汉朝至公元220年被曹魏取代,前后经历了四百余年的时间。魏经历的时间很短,就被司马氏所建立的晋(西晋)代替。西晋建立不久,发生了“八王之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的少数民族乘机入侵,割据北方。西晋灭亡,北方进入所谓“五胡十六国”的时代,战乱延续了一百余年。在南方,东晋灭亡后进入了南北朝时代;北方鲜卑族的拓跋氏征服了北方诸国,统一北方,建立了北魏,后又经历了北齐、北周;南方则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公元581年隋文帝统一中国,结束了南北对峙。隋朝经历的时间只有三十八年,公元618年被唐朝取代。

这个历史阶段的诗歌,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并按照中国诗歌的内在规律十分迅速的发展。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其特点,那就是:在这八百年的时间内,诗歌创作的高潮一波接着一波,不断走向成熟,并向着它的高峰——唐诗阶段迅速迈进。

为什么不用传统名称

按本书选诗的范围,书名应当叫做“汉魏晋南北朝隋诗新选”才比较合适,但这样的书名,无疑显得过于啰嗦了,所以,古今的有关选本,一般都不用这样的名称。现代学者为这个阶段诗歌选本拟定书名,一般多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一是“汉魏南北朝诗选”(或“汉魏晋南北朝诗选”);一是“汉魏六朝诗选”(所谓“六朝”是指在南京建都的六个朝代,即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两种书名虽然简洁了,但却都严重含概不全:前者缺少西晋、东晋和隋,后者缺少西晋、北朝和隋。从时间上看,都缺少了二三百年的时间,即缺少了这段诗歌全部发展历程的三分之一以上。

除上述名称之外,古代关于这个阶段诗歌选本(或全本)名称的拟定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即“八代××”,如明代梅鼎祚《八代诗乘》、清代陆奎勋《八代诗揆》、王闿运《八代诗选》以及近人丁福宝《八代诗精华录笺注》等。另外今人程千帆在《古诗今选》的目录中,也把这段诗歌称为“八代诗”。可见,这样的书名也是比较通行的。

“八代”一语出于苏轼《韩文公庙碑》:“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是指汉、魏、晋、宋、齐、梁、陈和隋等八个朝代。可见,“八代××”的书名所含概的朝代和时间比上述书名是多了一些,但还是把北朝诗即北魏、北齐和北周诗这样一个重要部分漏掉了。

将这些书名统而观之,就会发现“汉魏六朝诗选”和“八代诗选”所漏掉的部分虽各不相同,但却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都缺少北朝。

“六朝”和“八代”都是汉族地主统治阶级所建立的政权,与少数民族统治阶级所建立的北朝政权,属于“华”、“夷”两个范畴,在以汉族为中心的古代社会中,“华”、“夷”之间有不可逾越的大限。选诗着眼于“六朝”“八代”,实际是着眼于汉族诗歌;而忽略北朝,

主要是忽略少数民族的诗歌。这种以“六朝”“八代”替代北朝,以汉族诗歌代表少数民族诗歌的做法,实际上是古代的一种民族文化歧视,是汉族中心论或大汉族主义观念的反映。这种观念表现在各个领域,并已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种传统观念。在现代的有关论著中使用这一类名称,实际上也是这种观念的延续,是有意无意地受其影响的结果。

或许认为,北朝文学的成就和重要性都不如南朝文学,因此可以以南朝文学代表它。这种认识不符合实际,是完全错误的。北朝(主要是北魏、北齐和北周三朝)不但产生了为数相当多的诗人,如庾信、王褒、邢邵、魏收、颜之推、刘昶、温子升、萧慆等,其中不乏在文学史上广有影响的大家。例如庾信的创作,健笔凌云,苍劲沉郁,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时代苦难的一个方面,成为那个时代的诗歌艺术成就的代表之一。不止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北朝乐府中的民歌,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方法上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不但补充了南朝乐府的不足,而且其地位和影响早已超出了它所属的时代,成为文学史上的亮点而辉映古今。

北朝文学所取得的巨大而独特的成就,是南朝文学所无法替代和掩盖的。

事实上,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社会环境,北朝文学,无论是文人的作品,还是民间诗歌,都是处于自觉不自觉的民族文化交流之中,并在产生的当时就已为汉族和少数民族所共享:那些从南方来到北方的诗人的作品自不必说,就是那些在北方土生土长的乐府民歌也是如此。例如著名的《敕勒歌》等一大批优秀的北朝乐府民歌,本来都是用鲜卑语写成,在北方流传,但很快就被译成汉文传入南方,并在翻译和向南方流传的过程中,不断被修改和润色。这类被翻译成汉文的乐府民歌,至梁代为数已相当可观,引起了梁代乐府机关的重视和注意。在将它们收入乐府时,在其所属的“鼓角横吹曲”前加上了一个“梁”字,成为了“梁鼓角横吹曲”。

这充分说明北朝文学早已经融入了南朝文学,汉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经过融合,都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文学融合只是文化融合乃至民族融合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北朝文学与南朝文学融合的同时,北朝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与汉族文化融合。北魏建立不久,就完全采用了以礼乐文化为中心的汉族文化,他们在朝廷内外行古礼,正礼乐,并建立学校加以系统地传习,甚至在语言和风俗方面也大力提倡“汉化”:禁胡语、学汉文;废胡衣,穿汉服。此外,还流行与汉族通婚,娶汉女,改汉姓。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无论是对汉族还是对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这说明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的融合,共同推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有其深刻的时代历史和文化原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为了名副其实,使书名能够全面、正确地反映书的内容,本书书名没有采用传统的“汉魏六朝”、“八代”等概念,而是在“八代”后面加上了“三朝”两个字,成为“八代三朝”,其具体所指是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和北魏、北齐、北周“三朝”。这样的书名与所选的这十一个朝代诗歌的实际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在中国诗歌史上,为什么要把这十一个朝代的诗歌作为一个阶段,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是根据我国诗歌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划分的结果。具体说来有两个方面:

一、从这个阶段自身来看:从汉至隋这八百余年间,正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具有生命力的两种诗体,即五言诗和七言诗产生、发展和成熟的时期。五言诗产生于西汉,在汉乐府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东汉时期大量出现的文人五言诗,标志着这种诗体已经完全成熟。最早的七言诗是所谓的“柏梁体”,出现于西汉武帝时期。诗歌史上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出自魏曹丕,直至南朝宋代的鲍照创作出大量的七言歌行才标志着这一诗体的真正成熟。以诗体出现的历史作为诗歌史阶段划分的标准,这八百年恰好自成一个完整而独

立的阶段。

二、从全部诗歌发展史来看：如果把全部中国文学划分为上古期（先秦、两汉）、中古期（魏晋至明代中期）和近古期（明中期至“五四”时期）三个大的阶段的话，那么，这个阶段的诗歌恰好处于上古期后半段和中古期前一段；按朝代来说，就是处于先秦时代之后至唐代之前。先秦时代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奠基时期，唐代则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而这段诗歌正处于它们之间，即由基础走向高峰的历史过程中。由此不难看出这段诗歌发展的地位、重要性以及对于后代的影响。例如，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尤其显得突出：“这无数的民歌在几百年的时间内竟规定了中古诗歌的形式体裁。无论是五言诗，七言诗，或长短不定的诗，都可以说是从那些民间歌辞里出来的。”^①这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阶段与包括唐诗在内的中古诗歌的内在联系。

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文学个性

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文学个性，是“八代三朝”诗歌在思想内容上的最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特征在民间文学创作和文人作品中都有明显的表现，这里先谈文人诗歌创作部分，关于民间文学所反映的时代精神问题在后面另述。

汉魏文学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并富于文学创作个性的，当属于汉末和魏初的建安诗歌。以“三曹”（曹操、曹丕和曹植）和“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和刘桢）为代表的建安诗歌产生于社会乱离苦难和个人颠沛困顿之中，时代特征和个人经历先天地决定了其作品的悲剧色彩。对于社会动乱、民生疾苦和个人不幸，他们敢于正视，持有昂扬积极的态度，所以，在反映社会现实矛盾的同时，能够高扬理想精神和正义情怀，从而赋予作品以

^① 胡适《白话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强烈的时代色彩和个性特征。

比如曹操《蒿里行》具体描绘了汉末军阀内讧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真实地反映出汉末社会的本来面貌，被誉为“汉末实录，真史诗”。（钟惺《古诗归》）他的《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诗篇都贯穿着生命有限、壮志无穷的思想，洋溢着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

即使是朋友之间赠答、送别这类纯属个人关系的诗歌，在建安诗人的笔下，往往也不同凡响，而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曹植《送应氏》，是其送别友人应瑒之作，但第一首却不写送别，而专写战乱后洛阳残破、凋敝的景象，抒发其处乱世而思太平的忧国忧民情怀。以这样的情怀写送别，便把个人之间的友谊与社会、人生结合起来，从而超越了一般的送别诗。在赠友人和送别诗中抒写时事世态，抒发壮志情怀，使作品的内容得到极大升华，似乎是曹植这类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如《赠徐干》、《赠丁仪》都是如此。与时代和社会的紧密联系是建安诗歌的普遍特征，所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这也正是“建安精神”的最重要内容。

在其后的“正始文学”中，阮籍的《咏怀》曲折隐晦，实际也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一方面暴露司马氏统治集团的罪恶以及礼教的虚伪和自私，一方面表现出对于忠义报国，英勇无畏精神的向往，反映了诗人奋发有为的一面。所以“归旨难求”的《咏怀》，实际是高压政治条件下一个苦闷心灵的呼声，钟嵘《诗品》说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是抓住了其内在精神的中肯之论。

西晋左思的《咏史》是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咏史诗，与一般咏史诗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与时代精神的紧密联系。它不是简单的咏唱古人、古事，而是“借史事以咏己之怀抱”，（张玉谷《古诗赏

析)抒发下层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种种复杂心态,特别是有志不得伸展的悲愤与苦闷。在八首《咏史》中,除第一首《咏史·弱冠弄柔翰》写自己的文才武略,具有“自我评介”的性质之外,其他几首更多的是针对用人制度和人才受压抑的社会现实。如《咏史·郁郁涧底松》、《咏史·主父宦不达》等,都直接抨击了士族门阀制度统治下“世胄躋高位,英雄沉下僚”的不合理的制度,抒发了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的极大忧愤,为受压抑和被埋没的人才鸣不平。其锋芒所向,是历史和现实中一切有关的制度,而不是针对某一人一事,由此而使这些咏史诗更具有了批判的深度。在《咏史·济济京城内》一诗中,通过声势显赫的豪贵之家与门庭冷落、专心著述的扬雄之间的对比,赞美了扬雄贫贱不移,不慕富贵的高尚情操,反映出诗人的道德追求和人生价值取向。

左思之妹左芬虽只留下一首《感离思》,但却以其独到的内容赢得了不朽的价值。此诗写她被选入宫二年来对家人的殷切思念,所表现的不是一般的离别之念,而是被“皇恩”阻绝的痛苦之思,从而超越了一般的宫怨诗。诚如钱钟书所说:“宫怨诗赋多写待临望幸之怀……左芬不以待至尊为荣,而以隔‘至亲’为恨,可谓有志。”^①在封建时代,“皇恩”降临是一般人梦寐以求的最大荣幸,但诗中却把亲情看得高于“皇恩”,这不但使之摆脱了一般的世俗之见,而且达到了内心情怀的时代顶峰。

东晋时代陶渊明的诗歌,以其丰富的社会内容,深刻的思想见解以及对于个人心灵历程(也可以说是个性构成)的具体揭示,赢得了鲜明的时代性特征。

反映时代呼唤和人民内心的向往是陶渊明诗歌的最大成就之一。

自东汉末期至陶渊明时代的几百年间,战争从未间断,饱受黑

①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三册第1103页。

暗政治、战争和动乱之苦的广大人民的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摆脱灾难和痛苦，过和平、安宁的生活。陶渊明在《桃花源诗并记》中所描绘的那个没有剥削和压迫，因而也没有饥饿、贫穷和战争，人人自食其力，充满安乐和幸福的理想国，所直接传达的正是时代的要求和广大人民内心的呼声，充分反映了他们对于黑暗、混乱现实的彻底否定和对于美好、幸福未来的强烈向往。

就从社会理想、社会制度的角度反映人民内心呼声的层面看，可以说中国古典诗歌中鲜有作品能够与它相媲美。

还有一些诗歌表现了陶渊明很多新颖而深刻思想，这些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抒发的感情都具有时代的前沿性。

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开头即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宗明义即提出经营衣食是人生头等重要的大事，并将它提高到人生应当遵循的常道的高度，充分说明他对于通过劳动创造财富的物质生活的重视。这是一种深刻而实际的重农思想，闪烁着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在当时盛行空谈，不务实际的社会风气中，陶渊明的这一思想可谓别开生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在陶渊明的很多诗中还表现了对于劳动人民艰难处境的深刻同情和理解。这种同情和理解，在陶渊明那里十分自然而真实，毫无矫情和做作。这是因为他亲自耕种，自食其力，长期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使他不但真切地感受到劳动人民的困苦和不幸，更为重要的是真切地听到了他们的心声。

陶渊明虽然长期隐居田园，但并没有忘情于现实，即使是在一些神话、遥远往事的评论和感慨中，也曲折的反映着这一点。《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一诗，除表现刑天和精卫誓死不屈的奋斗精神，还突出表现了与命运抗争失败的无奈和痛惜。陶渊明之所以要突出这后一点，是因为他虽有济世之心，但却无法改变黑暗的现实，由此而产生了对于失败英雄的强烈共鸣。在《咏荆轲》中

没有简单地复述史实,而是突出生离死别、感动地的悲壮气氛和对于荆轲失败的无限叹惋,曲折地反映着陶渊明对于暴政和强权的否定态度。

关于陶渊明诗对于他自己心灵历程的表现,后面我们还有详细的分析。

除此之外,在两晋诗人中,陆机《猛虎行》对于人生多艰的深沉感慨,刘琨《扶风歌》、《重赠卢谡》对于功业无成的痛切悲叹以及慷慨豪壮、幽愤郁结的情怀,也都富于时代色彩。

南朝诗人中最富于时代特征和文学个性的是宋代诗人鲍照。鲍照出身寒门,位卑才高,其代表作《拟行路难》从多方面表达了士族制度统治下寒门士人对现实的态度和内心情怀,特别抒发其面对世路艰难,遭受排挤打击,理想抱负不能实现的忧愤不平,从总体上塑造出一个生不逢时,欲有作为而不能,而只得对案不食,拔剑叹息的士人的形象。这个形象具有愤激郁闷的悲剧色彩和慷慨奔放的精神气质,已经成为那个特定时代的士人人格的象征。

北朝诗人中最富于时代特征的是庾信后期的作品。庾信四十二岁时出使北魏,恰值梁朝灭亡,不得返国,遂长期漂泊异乡,屈仕敌国。他的作品,特别是《拟咏怀》诸篇,多以江陵陷落,梁朝灭亡为背景,把亡国之痛,羁臣之辱以及身世之叹,也就是把个人的命运遭际与国家、民族的历史交织在一起,赋予这些诗歌以更丰富的社会意义。与庾信相似的是王褒。王褒到北朝后,诗风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多写羁旅之愁,故国之思,有苍凉、悲抑之气。

以上是时代精神、时代特征和文学个性的角度对“八代三朝”诗歌所做的简单考察。时代精神包含着时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体现着时代发展的基本诉求和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系;而文学的个性则是文学成熟的标志,反映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和诗人的艺术审美追求。时代精神强烈,文学个性鲜明,是文学现实性、丰富性和艺术成就的综合表现。

对内心世界的深刻揭示

“八代三朝”诗歌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对内心世界的深刻揭示,这与一些诗歌着重揭示外部世界(如前所说的反映历史和社会现实等等)共同构成文学作品的两个重要方面。如果说客观世界无限丰富广阔的话,那么主观世界则是如大海般的渊深,同样也是文学取之不尽的源泉。

深刻入微地挖掘人的内心世界,把抽象而难于把握的内心感情具体化加以充分地展示,空前地充实了诗歌的内容,提高了诗歌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力度。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之所以一向被认为内容复杂,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它主要是写人的内心世界。朱自清在谈到《今日良宴会》时说:“这首诗所咏的是听曲感心;主要的是那种感,不是曲,也不是宴会。”^①所谓主要写“那种感”,即重点写内心世界,也可以说是全部《古诗十九首》的基本特征。

例如《青青陵上柏》写失意者游京城的感觉和慨叹,主要不是写“游”,而是写“感受”和“慨叹”。具体说来,既有对于豪门权贵的不满,又有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颓废;既有被压抑的痛苦,又有无可奈何的旷达,多侧面地揭示了失意者的复杂心态。《回车驾言迈》从万物变化,人生易老,提出了带有人生哲理性的问题,流露出机遇难于把握的无奈,同时表现出及时努力,立身扬名的进取精神。《东城高且长》有感于岁月流逝,四时交替,而主张放荡情怀,娱乐身心,表现出耽于享乐的迷惘和沉沦以及寻求解脱,排除苦闷的向往。

反映思想矛盾和内心的微妙变化,也是陶渊明诗歌的重要内容。

读陶渊明诗,眼前时时会浮现出诗人悠闲、静穆和恬淡自如的

^① 朱自清《古诗歌笺释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

形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诗中多有心理和感情的抒写。《乞食》一诗写诗人向友人乞食而又难于启齿的复杂心理:诗人被饥饿驱使而又不知何去,可见其内心茫然;敲开门而不知如何开口,透露出羞涩;看到主人善解人意,心中方才踏实和欣慰,直至表示感激……由于真实地再现了诗人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和艰难处境,诗人的形象随之跃然纸上。

《归园田居·怅恨独策还》写他隐居生活中一段由怅恨失意到欣喜欢乐的变化过程,表现出诗人对于隐居生活的由衷赞美。《杂诗·人生无根蒂》是基于他五十年人生经历和经验的总结,但却充满了思想矛盾:一方面认为人生来就应当相亲相爱,及时行乐;一方面又认为时不我与,应及时努力,有所作为。在《饮酒·少年罕人事》中写了他复归本性,守志不移,但又充满寂寞、痛苦的心理。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贯穿陶渊明的一生,在很多诗歌中都有表现。尽管有时他也陶醉在田园和农耕而自得其乐,但这种心理却始终没有消除,它深刻地反映出诗人“猛志逸四海”却不能施展的无奈。

南朝刘宋的谢灵运以山水诗著称,但有些诗歌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例如《入彭蠡湖口》所写景物都笼罩在抑郁、幽暗的氛围中,表现出诗人在不断遭受打击下的忧闷、愁苦和悲伤的心情。这种感情心理在《登池上楼》和《登江中孤屿》等诗中也有明显的表现。

此外,在阴铿的诗中,也多反映悲伤、惆怅的感情,如《江津送刘光禄不及》、《晚出新亭》都比较突出。

在反映爱情、婚姻、家庭的诗歌中,对于封建时代妇女内心世界及其特点的揭示更为深刻和全面。在这方而很多诗人都做了尝试,表现的重点多是婚后妇女的心理及其变化,其中一个主要内容是全而表现在丈夫离别的情况下,妇女的复杂心态,曹丕《燕歌行》和徐干的《室思》是这方面比较突出且影响较大的作品。前者

即曹丕《燕歌行》，不但写了对淹留远方丈夫的思念以及由此引起的悲伤、痛苦和忧虑，还特别从她对于夫妻离别和痛苦的原因所提出的怀疑，表现出不满于现状的朦胧意识。后者即徐干的《室思》除写相思的痛苦之外，还特别写了自我劝慰的矛盾心理以及对于丈夫的宽容，更进一步地表现出这位思妇非同一般的豁达心理。

封建时代的妇女，由于经济不独立，在家庭生活中也必然依附于丈夫，因此，丈夫的同情和理解也就成为她们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妇女的这种特殊心态，在诗歌中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晋代傅玄的《豫章行·苦相篇》把妇女一生的命运分为几个阶段。其中特别写到妇女婚后对于丈夫的依附心理：“情合同云汉，葵藿仰阳春。”没有丈夫的爱，她们的生命也就失去了阳光。在这方面，梁代萧衍《织妇》一诗也十分突出。诗的最后四句，写思妇突发奇想，想到自己思念成疾的样于被丈夫看到，并因此而感到极大的慰藉。这位妇女的心态十分复杂：她迫切希望她的痛苦和对丈夫的一片真情能够得到丈夫的充分理解，更期待着能够得到丈夫的爱情。封建时代妇女的充满苦涩的内心世界被表现得竟是如此深婉微妙，实在是难得的传神之笔。

以上诸诗都出自于男诗人的笔下，那么，在女诗人自己方面对于丈夫淹留他方，又是如何看待的呢？令人意想不到的，她们的诗所传达出的却是另一种声音。刘宋时代女诗人鲍令暉《拟青青河畔草》写思妇的感情与上述男诗人完全不同，其重点不在思念上，而是突出青春易逝，红颜易凋的“恨”和“怨”。妇女内心世界的这另一面，是丈夫滞留不归，长期思念而导致的心理变化的结果。看来，对于在男权统治下的妇女的内心世界，男人们所看到的往往只是其软弱无助的一面，而对这怨恨不平的另一面却完全忽略了。

北朝诗人邢邵《七夕》一诗，涉及到妇女感情心理的深处：在表现牛郎、织女被阻隔，无法相会的痛苦时特别写道：“束衿未解

带，回銮已沾轼”，是说未及宽衣解带、亲昵温存而被迫返程的悲伤。十分明显，这已经完全突破了夫妻间的一般的思念，而是对于基于人性普遍要求的情欲的肯定。邢邵是北朝诗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束缚较少，有这样突破“禁区”的大胆之语是可以理解的。

民间文学的重要地位

包括北方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民间文学在“八代三朝”文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这个历史阶段诗歌发展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八代三朝”的民间文学主要是指产生于这个时期的汉乐府民歌、南朝乐府民歌和北朝乐府民歌等。

民间文学是文学的源头，历代文学无不从中吸取营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于任何时代的文学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不过，我们这里所说的“重要”，不单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更有其具体的内容，即从它反映现实的广泛性、思想的深刻性和高超的艺术性以及对于文学发展的重要影响等这些方面来看，可以说，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民间乐府之于两汉，一如《诗》、《骚》之于周、楚。其文学价值之高以及对于后世影响之大，皆足以追配《诗经》、《楚辞》鼎足而三。”^①民间文学取得这样高的成就和历史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关于这三个朝代乐府民歌的数量、分类和保存情况在本书各有关部分已经分别做了具体介绍，关于乐府民歌的一般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有关论著和文学史也都有详细的评介，这里不再重复。我们只想从它们反映生活的特点和独到之处简单加以介绍。

^①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